

论梁代前期诗歌的多元交错局面

郭晨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1)

摘要: 梁初天监、普通年间, 齐梁文人围绕着萧衍、萧统父子为核心的文学集团, 形成了既不同于永明体, 也不同于宫体诗的诗风。学界对梁前中期文学评价普遍较低, 认为只是永明诗风的延续, 多于守成而少开创。其实, 梁初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 士庶的融合, 导致诗风呈现出总杂、多元交错的局面, 与昭明集团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对永明体的进一步发展, 是永明诗歌高潮和宫体诗歌高潮之间的重要过渡, 其贡献不容忽视。

关键词: 萧衍; 萧统; 永明体; 多元交错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2-0174-06

一、梁代前期诗歌的时代背景

梁代天监(502—519)、普通(520—527)、大通(527—529)一直到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去世, 学界一般将其分属梁代文学的前期。^①相对于前后的永明体和宫体, 一直被认为是两个文学高潮的底谷, “既不如齐永明体的辉煌, 也不如这之后的宫体诗有影响。”^[1]承永明文学之余续, 专在守成而少开创。实际上, 萧衍代齐(502)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使得时代风气和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诗风显示出更为丰富多样的态势, 形成了既不同于永明体, 也不同于宫体诗的特殊发展阶段。我们先看此期的时代背景。

刘宋以后, 随着北府兵将领的崛起, 中原望族进一步衰落, 寒素士人取得士族身份的比例不断上升, 士庶界限更加模糊复杂。“到了梁代, 情况和宋齐大为不同, 王谢等过江旧族, 到此时的社会地位已大不如前, 不但在朝廷中并无人居于要职, 在文坛上亦远非曩时可比。”^{[2](108)}庶族文人的才气学识已不亚于士族。中原望族的文化自信在军人出身的皇权面前逐渐崩。比如徐氏、到氏、阴氏, 当他们主动向世家大族靠拢时, 也就逐渐演变为新的文化贵族。由于上位者出身和教育政策的调整, 寒族士人逐渐登上政治舞台, “天监四年, 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 限以贵贱, 帝欲招来后进, 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 不限人数。”(《隋书·百官志上》)“(天监)四年, 乃诏开五馆, 建立国学,

总以五经教授, 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琰、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场补博士, 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 给其饩禀。”(《南史·儒林传》)保留原有国子学博延贵胄同时将五馆引进寒门子弟, 改变了以往官学只招收贵族子弟的现状。出于政教弘儒目的, 武帝登祚后, 一再提倡儒学。他撰有《周易大义》二十一卷、《尚书大义》二十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乐论》三卷、《孝经义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等。经学在南朝呈现出极盛的局面, 《南朝梁会要》设“选举”条“经学”项, 专载长于经学而入仕之人(《宋、齐会要》不存此项)且身份不限士庶。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南朝经学”条言: “梁武之世, 不特江左诸儒崇习经学, 而北人之深于经者亦闻风而来, 此南朝经学之极盛矣。”^{[3](315)}“十数年间, 怀经负籍者俱会京师”。

在用人政策上, 看重门第身份的同时重视寒门后学的才能。由于九品中正制, 士族多看中职闲稟重的“清显之位”, 秘书郎、著作郎仍是甲族子弟的起家之选, “平流进取, 坐至公卿”。齐代法令“甲族以二十登仕, 后门以过立试吏”, 《梁会要·选举》特分“素族士族甲族”和“寒门”两类, 说明士庶隔阂依旧存在。武帝在九品官人法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以策试作为主要标准, “秀才、孝廉、贤良成绩上等者, 中正评为第二品; 成绩中等者, 中正评为第三品; 成下等者, 中正评为第四等。所谓上等、中等、下等者,

收稿日期: 2015-10-29; 修回日期: 2015-1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3)

作者简介: 郭晨光(1986-), 女, 河南许昌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论

以策问中第为标准。”^{[4](105)}策试常引经据典，考察对经史的熟悉程度。天监九年三月，武帝车驾幸国子学，亲听讲肆。十二月，再幸国子学，策试胄子。“策射通明经者，即除官吏。”（《梁书·儒林传》）天监八年诏令：“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即便是贵族子弟，若不通一经，也不得解褐为官。虽是寒门士人，若能精研一经也可“随才试吏”。同时还给寒门士子指出了另外一条捷径，通过干谒公卿名流而获得推荐。范云对何逊的赏识，最初是因为看到了何逊举秀才时写的对策。出身贫寒如何逊、吴均之流，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才能，也是由南平元襄王萧伟荐之武帝。

总之，“梁武帝采取‘不问士庶，依照德才选用官吏，既防止无德行教养的寒人一味苟进媚事，又阻止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尸位素餐……在天监年间整理国政，徐勉、周捨等寒门出身的宰相励以治道。’”^{[5](387)}寒门子弟有机会跻身上层，士庶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缓和。《南史·陆倕传》载：“及（任）仿为中丞，簪裾辐凑，预其宴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倕而已，号曰‘龙门之游。’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只为才士而开，而无关门第，客观上也使寒门才俊有机会与贵族、皇族子弟交往。这些后学在梁代前中期围绕着萧衍、萧统父子，形成了由齐入梁以及在梁代成长的文士为主体的文学集团。这个文学集团实际是以萧衍为核心的皇帝文学圈和天监十四年萧统加元服后以其为中心的东宫文学圈两个团体。这两个文学团体有其一脉相承之处，集团成员多有交叉，出入皇宫和东宫；其创作多贵族化的应制、游宴之作，文学观念亦有相似之处。集团式的文学活动往往与其领袖有着极大的关系，萧衍以帝王之尊提倡文学，《诗品序》载：“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学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紘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6](41)}可以说，萧衍对于梁初诗风局面的奠定不无开启之功，而他又是一位复杂的人物，“对于其时各派之文学思想，似乎都可以兼容。”^{[7](282)}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萧衍重儒崇雅，提倡雅正文风，重视文学的政教功用。当时朝廷用乐多有不合雅正之处，天监元年，他曾“思弘古乐”，下诏访集雅乐，亲自参与新王朝的礼乐建设，“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隋书·音乐志上》）《敕萧子云撰定郊庙乐辞》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天监四年“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他还编选了《历代赋》一书，表达自己崇尚古典的文学观念。受其影响，梁初永明体遭遇挫折，不仅声律

说不被普遍采用，平易流畅诗风也多为主流不喜，开始向元嘉使事用典的长篇古体复归。萧衍制《千字诗》，冗长乏味，酷不入情，有过之颜延之、谢庄。“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以下同作……”（《梁书·王僧儒传》）作为“竟陵八友”之一，萧衍早年作过不少新体诗，如《雍台》“旧落登雍台，佳人殊未来”，与永明体近似但仍带古质之气。永明四年萧衍曾为王俭东阁祭酒，受其使事用典诗风的影响，对永明作家倡导的清丽平易诗风有所不满，意欲恢复元嘉诗风，以纠正永明诗歌之偏颇。使事用典的思想根源在于崇尚博学，如“（刘）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梁书·刘显传》）为了方便用典，此时聚书、编纂类书成风。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8](517)}编纂类书上，武帝曾命学士编《华林遍略》，以求压过刘孝标《类苑》。在武帝干预下，梁初诗风有意识越过永明诗歌短小清丽，向元嘉诗风高古典正靠拢。正因为长篇高古和使事用典与元嘉诗风更易融通，体裁短小的永明体所不能容纳，也是永明体暂时消歇的重要原因。

第二，代表新进士族欣赏趣味的媚俗侧艳诗风开始流行。萧衍属军功起家的庶族，无晋宋高门之清高自持传统，其文学趣味更接近流俗。萧衍出于政教目的提倡雅乐，但在个人兴趣上更倾向流行的江南俗曲。“普通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伎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南史·徐勉传》）另据《乐府诗集·江南弄》解题注引《古今乐录》载：“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王运熙先生即说：“《江南弄》与《上云乐》的创制参考了西曲《三洲曲》的和声、杂舞曲辞《拂舞歌》《淮南王曲》《杯盘舞歌》，并受创印度、西域音乐的影响，具有吴声、西曲、杂舞曲及外国音乐的优点，造成声调曲折，句法参差的新声。”^{[9](217-218)}大规模的改制西曲，风格新艳绮丽，直接导致了后期宫体诗的发轫。据笔者统计，萧衍存诗 106 首，涉及“艳情闺怨”的有 54 首，占一半之多，可见其趋俗的一面突出。

第三，部分恢复继承了抒写个人情志的汉魏寒素文学。一方面，其拟作乐府古辞，如《有所思》《长安有狭邪行》《拟青青河畔草》等，质朴古雅；另一面是征战、游侠、边塞等军事题材的兴起。现存南朝一百多首边塞诗，多为梁后作品。武帝《戍边诗》《古意诗》等，写征成分离之苦，《宴诗》写息兵止杀，透露着功业理想，直接上承汉魏寒素文学精神。

总之,梁武帝倡导的诗风迥异于永明诸家,奠定了梁初诗风总杂、多元化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士族中不同阶层的消长和作家队伍的变化,又对文学本身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二、从士庶融合角度看梁初诗歌的多元化局面

作为昔日贵游,沈约、范云、任昉、萧衍、柳惔等原西邸旧部大多年事已高,他们不仅将永明文学特色带入梁代,更多精力用于奖励后学、提携新人。比如:

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刘)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讌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疏。(《梁书·刘苞传》)

及(任)仿为中丞,簪裾辐凑,预其宴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倕而已,号曰“龙门之游。”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梁书·任昉传》)

据笔者统计,有殷芸、到溉、到洽、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萧映、陆倕、张率、谢举、谢览、王规、王筠、王训、张缅、张纘、江革、丘迟、王承、曹景宗、何逊、吴均等。这些后辈大多二十多岁,武帝与其游宴、娱乐,气氛较宽松,地位相对平等,不因后辈的出身、年龄、官职而小视之。其中多人还入侍东宫,为《文选》的重要编纂者,属昭明集团成员。梁初文风呈现出以贵游文学为主体,同时由于庶族文化地位的上升,士庶身份的混融而更加复杂多样的不同态势。前者表现为对诗歌用典的发展,后者表现为像何逊、吴均等出身较低的诗人的崛起,以及宫体诗风的兴起。以下分而论之。

一是发展融合元嘉、永明诗风,以新典促进隶事新变。由于知识结构单一和思维惯性,用典难免呈现出雷同化的趋势。时任昉为文坛盟主,《南史》本传称:“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时有才尽之谈矣。”《诗品》评任昉:“但昉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久之必将导致文风枯竭。沈约率先对用典进行革新,“在征引儒典的基础上,吸纳子部、史部及汉晋名家名作等语料。”^[10]使用新典成为新风尚,《诗品序》称:“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如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江津寄刘之遴诗》、陆倕《以诗代书别后寄赠诗》等侍宴赠答之作,多用新典且追求典故的游戏化、趣味化。其实诗歌用典并非只是元

嘉诗风的专属,永明诗也多用典故,王融《从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诗》,五言十四句,句句属对,用典十分繁密。梁初用典一派实际也是永明王融诗风的延续,但强调“词不贵奇”“用典不使人觉”,不至于造成理解困难,是对“易见事”的继承,走的是元嘉融合永明的新路。有关新典的来源与时人追求博学以及聚奇僻之书的风气有关,《南史·顾协传》载:“协博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梁书·王僧儒传》载:“僧儒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其文丽逸,多用新事者,人所未见,世重其富。”可以说,永明年间,对诗歌的新变主要体现为声律的一面,梁初则是发展了用典的另一面,在保证文风典实雅正的基础上追求新颖奇异的隶事形式,是新体在梁初发展平缓的表现,也是贵族高雅欣赏趣味的体现。

二是庶族文学有所上升,恢复了永明一度断裂的抒写个人情志的汉魏寒素文学,最明显表现为吴均、何逊等出身较低诗人的崛起。他们大量拟作乐府古辞,吴均有《战城南》《雉子斑》《从军行》,何逊有《苦热》《铜雀妓》《昭君怨》等。《梁书·文学·吴均传》载其“家世寒贱”,属庶族寒门无疑。其诗作多抑郁不平之气,如“天子既无赏,公卿竟不知”(《赠别新林》),感慨有功不赏。狂夫、游侠也是常出现的意象,“中人坐相望,狂夫终未还”(《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其六),“结客少年归,翩翩骏马肥。报恩杀人竟,贤君赐锦衣”(《结客少年场》),“非独泪成珠,亦见珠成血”(《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其三),继承了汉魏诗风的骨力、情感深度,戴明说评其“骨法猛,思径险”(《历代诗家二集》),陆时雍评其“粗浅无文,好为杰句,只得俚耳。贫人饰富,识者自知其绽”(《诗镜》),尖锐地指出其寒贱诗风。吴均诗在当时有一定的追随者,被称为“吴均体”,如纪少瑜《拟吴均体应教诗》。《南史》本传载其“早孤,幼有志节……年十九,始游太学……”,可见属寒门游学之士。另《梁书·吴均传》后附当时文学之士,“广陵高爽、济阳江洪、会稽虞騫,并工属文。”可见此派多半出身偏寒。何逊曾祖父为刘宋何承天,官至御史中丞,但到了何逊年代,已变成“宗派已孤狭,财产又贫微”(《仰赠从兄兴宁南》)的状况,一生仕宦基本滞留于参军、记室等中下等官职。他与吴均有相似的心态,“东汉魏晋以来门阀士族数百年的发展,尤其使得门第峻域观念深深渗透于社会文化、心理之中,乃至门第低微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潜在而深刻的自卑之感。”^{[11][190]}何逊作《落日前墟望赠范广州云》“高门盛游侣,谁肯进岐渔”,想要干谒范云又忐忑自卑。何逊与刘孝绰、江革、刘孺等贵游子弟有大量联句,其《嘲刘谿议》“妖

女婁帷出，蹀躞初下牀”嘲笑刘孝绰留恋床第，也反映了两人的友好关系。

三是代表下层文人喜好艳情诗开始兴盛，也迎合了贵游阶层对声色、情欲的欣赏口味，直接导致了宫体诗的发轫。从齐代开始，以鲍照为代表的“俗丽”“淫丽”诗风开始受到重视，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其与谢灵运、颜延之并列为“三体”之一，“永明、天监之际，鲍体独行，延之、康乐微矣。”（吴乔《围炉诗话》）武帝将吴歌、西曲引入皇宫，迎合贵游阶层以诗为戏的创作态度。萧子显《日出东南隅行》《代美女篇》以齐梁绮靡之体拟古乐府。张率《日出东南隅行》通篇描摹女色和装饰，纯为宫体之流。刘孝绰有《爱姬赠主人诗》《遥见邻舟主人投一物众姬争之有客请余为之咏》《咏姬人未肯出诗》等诗，词旨放荡，格调低下，《玉台新咏》收刘孝绰诗13首，暗示其宫体诗人身份。何逊诗作亦多今事之艳，更接近后来的宫体诗，如《嘲刘谿议》《咏娼妇》《咏照镜》等，将女色作为具有审美特色的“物”，文辞冶艳，多色情描写，为宫体之渐。许槌《六朝文絮》将其《为衡山侯与妇书》称为“婉娈极艳”的“香奁之作”。底层文人趋新趋俗的文学趣味与贵游阶层的奢侈、玩乐爱好不谋而合。

三、从士庶融合看昭明集团的文学观念

天监元年(502)，萧统被立为皇太子，十四年(515)行冠礼，以其为中心的东宫文学集团正式形成，萧统成为梁初文坛的实际东道主。在武帝的培养下，萧统“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梁书·昭明太子传》），“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任、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缵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南史·王锡传》）这些后辈兼经学与文学之才，据胡大雷先生统计，萧统文学集团有：刘孝绰、王筠、殷芸、陆倕、到洽、明山宾、陆襄、张缵、谢举、王规、王锡、张率、刘勰、徐勉、何思澄、刘杳、顾协、钟屿、杜之伟、刘陟、刘苞和庾仲容。^{[12][148]}成为太子侍读，自然是武帝的刻意安排。其中刘孝绰、何逊、王筠、刘勰、张缵还可能是《文选》的重要编纂者。^②

萧统的文学思想与其父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所不同，其集团成员身份的复杂多样，士庶融合无疑又与集团的总体创作倾向和文学观念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与武帝一样，萧统的文学思想比较复古，重视文学的教化功用。《文选》收诗，选谢朓诗21首，沈约诗13首，且特意选了一些长篇，如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36句，《始出尚书省》《和王著作八公山》30句。沈约的《钟山诗应西阳王教》40句，《游沈道士馆》28句，可能为了迎合萧衍偏重长篇的喜好。在对待声律态度上，《文选》几乎没有收录新体诗，对永明声律说的态度比较消极。“从这里可以看出某些端倪，即萧统对于过分考究声律藻饰的作品不甚以为然。”^{[13][375]}他对陶渊明文学价值的发现也是基于其淡薄名利、高洁自持的人格、怀抱，“此亦有助于风教也。”（《陶渊明集序》）

二是提倡雍容典雅的贵族诗风，对寒庶诗风持批评保留态度。由于武帝对齐宗室和文人相对宽容，没有大肆屠戮。天监年间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时人更加青睐“符合经典，处理好了内在与外形的关系，诗歌表现了主体在差异中悠游从容的愉悦，在质朴的感性和美的超越间保持张力，使艺术文本在结构上简约，具有文外之旨。”^[14]这种近似中庸的雍容诗风。相应的，对寒素诗风不以为然。以何逊为例，他发展了汉魏古诗的写景传统，写眼前之景均是实见，即目写事，吟咏庭院里、旅行中的山水，有细微的写实倾向，尚自然，重抒情。其《宿南州浦》：“幽棲多暇豫，从役知辛苦。解缆及朝风，落帆依暝浦。违乡已信次，江月初三五。沈沈夜看流，渊渊朝听鼓。霜洲渡旅雁，朔飆吹宿莽。夜泪坐淫淫，是夕偏怀土。”常以“客悲”“愁怨”来表现生活、关照自然。贵游虽亦多写景，但是他们着眼于表现感觉和个人才华，并不用于反映生活。《颜氏家训》以何逊与刘孝绰作比，说明了当时的风尚：“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15][276]}刘孝绰帮萧统编撰《古今诗苑英华》，以其与何逊的良好关系却仅收其诗两篇，虽有嫉贤心理，主要还是由于主流不喜“清省”“形似”的诗风。

三是由于士庶融合，在庶族代表的汉魏寒素诗风的基础上加入贵族化的用典。既推重雅正尚典，又不排斥辞采之美，主张“雅而丽”，使其折中调和。这种不偏不倚、中允兼通的文学观念与集团成员的创作实践互相影响、渗透。萧统多拟作汉魏乐府，如《饮马长城窟行》《相逢狭路间》，注重从汉魏古诗提取典故和创作资源。《长相思》题目即出自《客从远方来》，“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取其相思绵绵之意。王筠《和吴主簿》之《春日二首》“于今方溘死，宁须萱草枝”“卷施心未发，薜荔叶欲齐”等，意象、句法上承汉魏古诗；刘孝绰《元广州景仲座见故姬》《摘安石

榴枝赠刘孝威》的诗意,分别出自《上山采蘼芜》和《庭中有奇树》。这里的典故已成为象征性的符号,赵翼言:“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16](456)}借重古诗“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看重典故带来的某种气氛和象征意义,既言简意赅又可引起人们对弦外之音的追寻,有助于诗歌深婉蕴藉之意境的形成,也与萧统“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古朴典雅的诗学理想相通。对于辞采,萧统《答湘东王书》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称萧统诗:“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萧纲也在《昭明太子集序》称萧统诗文“丽而不浮”。这些“折中”的文学理论,“要求诸种对立因素在量的方面达到均衡和谐,无过与不及之弊,而此种观点,实亦齐梁人所共有。”^{[17](302)}倡导的言情之正,“劝诫”与“丽则”相结合,“摘讥《闲情》,示戒丽淫,用申绳墨,游于方内”。^{[18](267)}

四、余论:梁初永明体的新发展

当时永明体虽然受到了一定阻碍,但仍以一定的形式缓慢发展,下面再来探讨一下新体在梁初的新发展。

一是将声律理论植入长篇,形成了长篇转韵体的新兴声律体裁。吴小平对梁初何逊、吴均、王筠、刘孝绰有过统计:吴均入律诗歌占3%,王筠2%,基本与永明体入律平均值(3%)持平。何逊入律达7%,以短篇为主,刘孝绰入律诗5首,约占总数7%,有长律、律诗多种。^{[19](243)}许学夷《诗源辨体》言:“刘长篇有转韵体最工。”以短篇致胜的何逊,也有《拟青青河畔草转韵体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送韦司马别》这样长篇换韵之作,这是声律体在梁初的新发展。

二是梁初新体使用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永明时期其仅限于沈约、王融等精于此术的文化贵族,声律在诗文写作中尚未普及。梁初诗作入律程度远高于永明时期,如《诗源辨体》卷八评谢朓:“此声律之渐。”评沈约:“休文论诗,有‘八病’之说,此变律之渐。然观其诗,亦不尽如其说,何耶?”卷九评何逊、刘孝绰“二公五言,声多入律”、刘孝威“声愈入律”、吴均“声渐入律”、王筠“声愈入律”、柳恽“声多入律”等^{[20](122-127)},认为远比永明入律程度高。像柳恽

这样在永明间已崭露头角,但在梁初才将声律体发扬光大。从王融、沈约开始到梁初贵游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齐梁体”。清钱木庵《唐音审体》:“齐永明中,沈约、谢朓、王融创为声病,一时文体骤变。谢玄晖、王元长皆没于当代,沈休文于时作手何仲言、吴叔庠、刘孝绰等并入梁朝,故谓之‘齐梁体’。”^③不仅“通两朝而言之”,还创制了既不同于永明体,也不同宫体的新体裁。杜晓勤指出:“‘齐梁体’诗的格律形式有粘对律、粘式律、对式律等形式。”^{[21](13)}永明体多对式律,梁初新体粘式律比重上升,且出现了合式的声律结构,如刘孝绰《陪徐仆射晚宴》五联,前三联粘式,后二联对式,粘、对并用,对新体诗声律的讲究远超永明诗人,在永明体与律体之间架起了桥梁。且用韵更加自由灵活,通过随文辨声营造诗歌音乐美。《梁书·王筠传》:“(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蜺’,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可见文士善于随文辨声,已不像永明时期那样机械。

注释:

- ① 有关梁代文学的分期问题,学界尚有争议,大致分为以葛晓音先生为代表的两期说(以梁改元大同535年为界)和三期说(刘跃进认为天监十二年沈约去世属前期;此后到中大通三年为中期,再以后为梁代文学的后期;清水凯夫认为天监年间属于前期,普通至中大通六年一段为中期,此后为后期)在此,我们倾向比较稳妥的说法,以大通三年(531)萧统去世为界,将梁代文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承永明文学余绪,萧统对萧衍多有承袭,其后萧纲入主东宫,梁代文学才发生了巨大变化。
- ② 学界对《文选》的编纂者尚存争议,除萧统外,据《梁书·刘孝绰传》《梁书·刘勰传》《梁书·王筠传》《梁书·张缙传》记载,还应有刘孝绰、刘勰、王筠、张缙。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录《文选》所注“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之语,还可能有何逊。
- ③ 齐梁体有多重含义,一指声律,即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集中所言齐梁格;一指风格绮艳和咏物之作。

参考文献:

- [1] 傅刚. 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的文学状态[J]. 社会科学战线, 1997(3): 118-126.
- [2] 曹道衡. 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08.
- [3] 赵翼. 廿二史劄记校证[M]. 王树民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15.
- [4] 毛汉光. 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M]. 台北: 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 1966: 105.
- [5] 宫川尚志. 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M]. 东京: 日本学术振

- 兴会, 1956: 387.
- [6] 钟嵘. 诗品笺注[M]. 曹旭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41.
- [7]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82.
- [8] 萧绎. 金楼子校笺[M]. 许逸民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517.
- [9] 王运熙. 乐府诗述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217-218.
- [10] 孙宝. 沈约与齐梁宗经隶事之变[J]. 文史哲, 2014(5): 61-69.
- [11] 景蜀慧. 魏晋诗人与政治[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90.
- [12] 胡大雷. 中古文学集团[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48.
- [13] 曹道衡, 刘跃进.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375.
- [14] 方锡球.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J]. 求是学刊, 2000(5): 84-90.
- [15] 颜延之. 颜氏家训集解[M]. 王利器集解.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76.
- [16] 赵翼. 瓠北诗话校注[M]. 江守义, 李成玉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456.
- [17] 王运熙, 杨明.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302.
- [18] 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 殷孟伦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67.
- [19] 吴小平. 中古五言诗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243.
- [20] 许学夷. 诗源辨体[M]. 杜维沫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122-127.
- [21] 杜晓勤. 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3.

The intersectionality of poetry in the early Liang Dynasty

GUO Chengu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group with Xiao Yan and his son Xiao Tong as the core men of letters gradually formed a special literary style which differed from Yongming Style and Gongti Poetry during the years of Tianjian and Puto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iang Period. Poetry in this period is considered of low value in academics. Critics hold that it is just an extension of Yongming Style which lacks innovation. In fact, the social changes and fusion of gentry and civilian which lead to the stylistic intersectionalit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literary principles of Zhaoming Group. Further development of Yongming Style i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from the climax of Yongming Style and Gongti Poetry, which can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Xiao Yan; Xiao Tong; YongMing style; intersectionality

[编辑: 胡兴华]